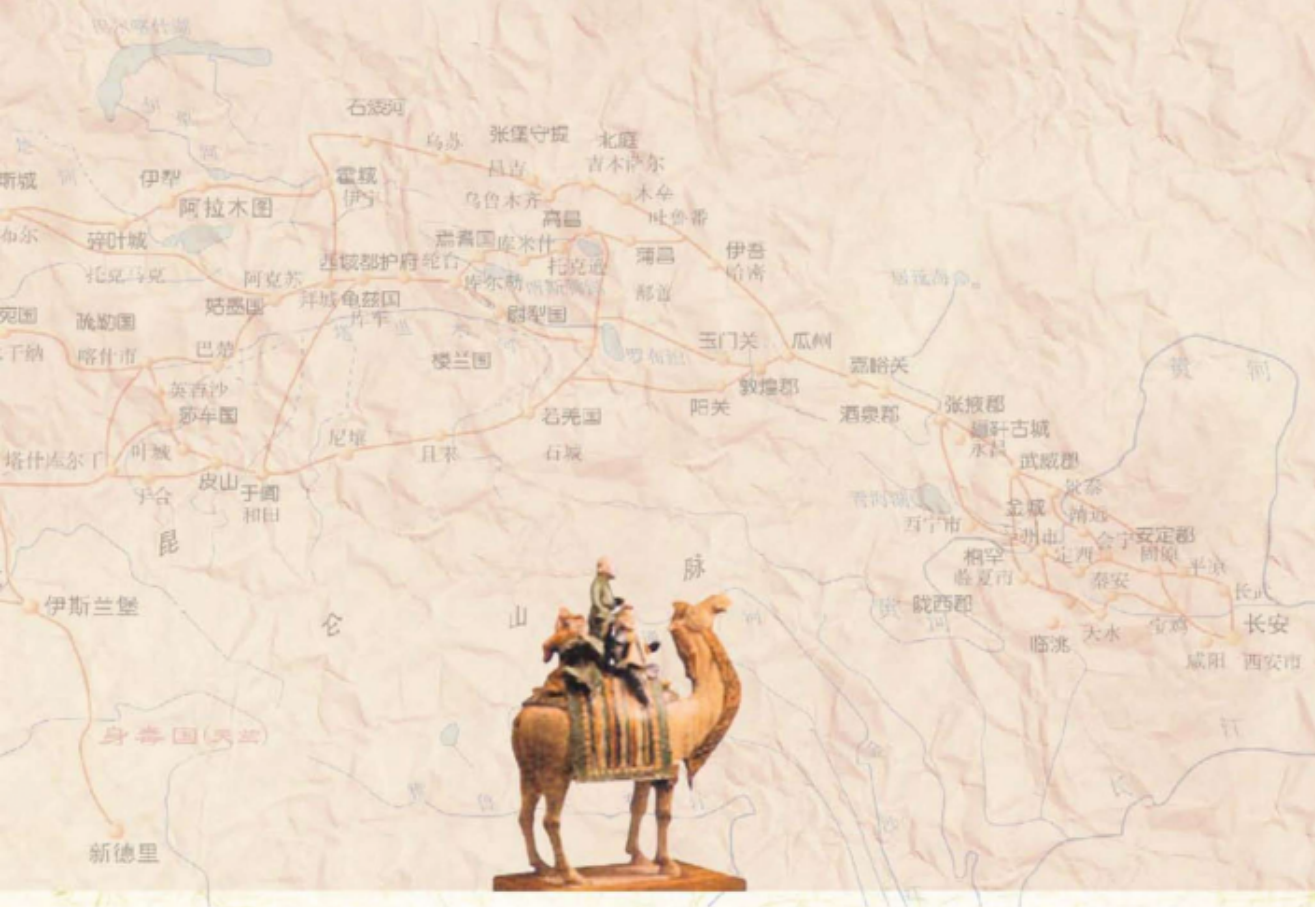


◎ 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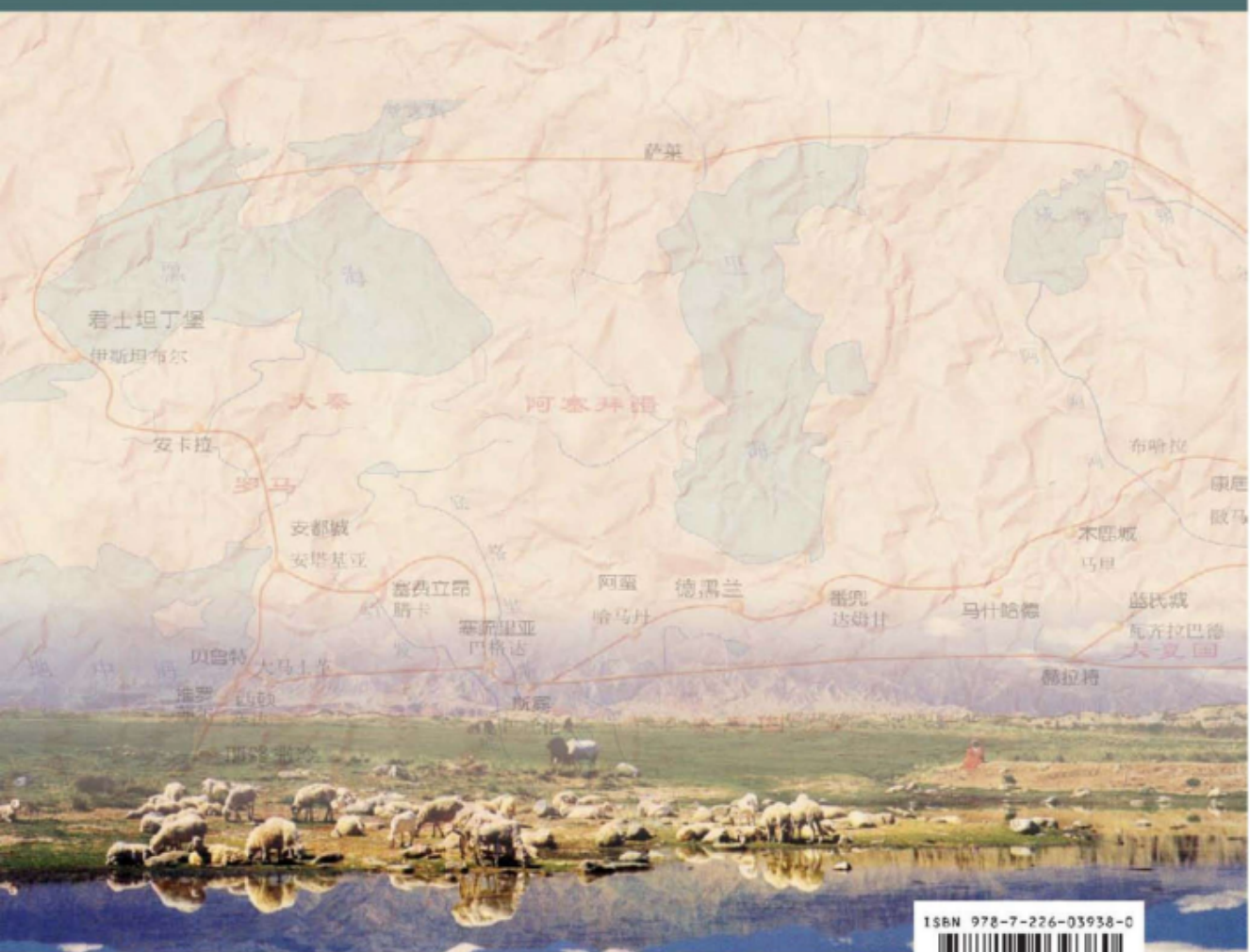
“草原丝绸之路”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柱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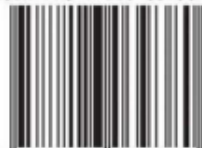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 强 || 封面设计：王林强



ISBN 978-7-226-03938-0



9 787226 039380 >

定价：70.00元

◎ 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7辑

“草原丝绸之路”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柱华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 “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榆林学院联合主办

◎ 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211”项目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张柱华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226-03938-0

I. ①草... II. ①张... III. ①丝绸之路—学术会议—文集②游牧—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928.6-53②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7874 号

责任编辑: 马 强

封面设计: 王林强

“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柱华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459 千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978-7-226-03938-0 定价: 70.00 元

目 录

丝绸之路与古代民族	周伟洲 (001)
考察草原丝绸之路的法国人	耿 昇 (007)
丝绸之路与古代东西文明交往	王 欣 (040)
“欧洲文化中心论”再认识	晁中辰 (053)
西方汉学边疆研究的理论取向和价值关怀	胡志宏 (062)
论草原丝绸之路的复兴	孙 永 (075)
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草原商路	
——以 5—14 世纪为中心	孙 泓 (079)
对“丝绸之路”源头和起点在浙江湖州新说的质疑	王心喜 (089)
3—6 世纪草原丝绸之路的利用	石云涛 (091)
唐代西北民族的“吐蕃化”及其对藏族形成的作用	杨 铭 (108)
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	
的作用	高 凯 (123)
甘州回鹘与丝绸之路	朱悦梅 杨富学 (161)
敦煌壁画中的杖具——笞杖、球杖考	胡同庆 (175)
略论和田马钱的希腊化背景	戴建兵 (183)
《突厥语大词典》中词汇及其医学与相关词汇的数量	杨东宇 (190)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	
——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万 明 (200)

明初甘肃的地缘政治与西北疆界的形成

- 由洪武五年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赵现海 (220)
- 浅谈清人视野中的西域 贾建飞 (237)
- 南北纵向丝路与环塔里木文明融合 廖肇羽 (246)
- 中外关系影响下的塔里木区域社会 李国平 (257)
- 唐代安西都护府渭干河西岸遗址群的调查与研究 邢春林 (265)
- 试述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边政策(提纲)
- 西藏—尼泊尔边境管理 董莉英 (281)
- 唐代吐谷浑在陕北的活动
- 延安市出土《李良仅墓志》研究 韩 香 (288)
- 明代历任延绥巡抚考略 陈长文 (296)
- 统万城、大城及相关问题 吴洪琳 (313)
- 陕北边塞文化述论 吕 静 (319)
- 北宋时期陕北地区的农业发展 杜林渊 张小兵 (326)
- 榆林地区近代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 吕 波 (334)
- 榆林教育述略 曹汉斌 (344)
- 榆林县域经济和谐发展的桎梏与出路 张柱华 (354)
- 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中的金银器皿带有外域草原
- 民族的艺术 庄明军 张安生 (362)
- 陕西奇人王徵与奇书《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邹振环 (368)
- 民国时期国际汉学史研究 李孝迁 (392)
- 日本“中国经学史”之译介与回响 王应宪 (414)
- 徐家汇藏书楼有关中国西部英文著作书目提要(1911年前) ... 马少甫 (425)
- 约翰·史密斯·托平:《中国穆斯林军阀:马鸿逵在宁夏
- (1933—1949)》述评 张天政 (442)

丝绸之路与古代民族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周伟洲

一、丝绸之路上的民族类型

丝绸之路原本是一条中西方以贸易为主体,涵盖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道路,而路总是人走出来的。^①因此,丝绸之路沿途的诸民族、国家的兴衰历史,自然也就成了丝绸之路发展、兴衰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丝绸之路沿途诸族的历史,有其自身社会发展兴衰的规律,但是,它们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丝绸之路的影响,有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

从丝路及其沿途诸族发展的历史来看,大致可将丝路上的诸族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种类型,属于丝路本源文化类型的民族。丝路的中西方文明的传播,主要可归结为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古代四大文明,即西方古老的希腊、罗马(包括古埃及文明)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和南亚古印度文明的东向发展,以及中国东方文明向西的扩展。属于这四大古文明圈的各族,分别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化,各有其特点。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半岛上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古希腊文明广泛传播于今西亚、中亚和印度北部,影响极为深远。公元一世纪后,古印度的佛教由中亚传入中国,影响了整个东方。这些都可视为通过早期丝

^① 本文所论之“丝绸之路”,是指狭义的丝绸之路,即学界最早提出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即是后来所的“沙漠路”、“绿洲路”及“草原路”。

绸之路,将古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向东方传播与发表的突出例证。公元前二世纪,东方的中国秦汉时期向西开拓,特别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及对西域的经营,此后中国丝绸之远销西方,则视为东方文明向西扩展的实例。而越靠四大古文明之地的各民族,则越受此文明的影响,各种本源文明像一个水波纹一样,各自向东、西方扩散。但是,这种扩散,即文明的传播,是靠沿途人们——民族来进行的,通过这些民族的居地构成的道路来进行的。这些道路就是我们所谓的“丝绸之路”。

第二种类型,属于丝路东西文明交往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他们主要处于东西方四大文明本源文化类型的民族之间,起到一个传播东西方四大文明的作用,即扮演着文明交往中继者和桥梁的角色。从西向东、从古以来,大致有希腊古文献所称的斯基泰人(Scythia,古波斯称为“Saka”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hae,其中最强大的称为 Massagetae),稍后的帕提亚(Parthia,中国史籍称为“安息”)、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史籍称为“大夏”)、粟特(Sogdian,昭武九姓)、大月氏、乌孙、西域三十六国、氏、羌、吐谷浑、吐蕃等,以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族等。他们虽然各自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也深受来自东西方本源文化诸族文化的影响。如南亚印度佛教,西亚、中亚流行的景教、祆教、摩尼教和稍后兴起的伊斯兰教对他们的影响;从中国内地向西传播的汉族的传统儒学及包括丝绸、漆器、瓷器、造纸、火药、印刷术等物质文明,对他们的影响等。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大致均可以归入上述两大类型,各个类型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又不尽相同。

二、丝路上的民族在中西交往中的作用

在丝绸之路上,属于第一种丝路本源文化的民族,是世界几个大的古代文明发源地的民族。如古埃及、希腊及后来的罗马等各族,两河流域的古苏美尔人、闪族人、亚述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南亚印度各族,东方最早养蚕织丝的中国华夏族等。他们创造的文明,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代表了世界古代历史的潮流。正是由于有了丝绸之路,才使代表各种世界文明的民族的本源文化得以相互交流,相互促进,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因此,丝绸之路才被学者们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运河”、“中西文化交流的

大动脉”等。作为丝绸之路本源文化各族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它作为丝路的本源和基础之上,可以说,没有这些创造世界各大文明的本源文化民族,就没有中西文明的对话和交往,就没有丝绸之路的存在。

但是,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处于中西方的各本源民族之间,通过丝绸之路的直接对话和交往,并不是普遍的规律和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丝路本身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另一方面是丝路沿途众多的民族、国家割据和战乱等。

就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公元前139年、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远仅达中亚大宛、大夏等国,传闻奄蔡、安息、条支等国。^①东汉时,西域都护班超曾遣甘英出使大秦,抵条支(安息),临大海(今地中海,一说波斯湾)而还。^②至公元二至九世纪,由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于是印度的僧人及内地僧人的弘法、求法活动十分频繁,见于中国史籍及佛教典籍记载颇多。这是古代中国与印度佛教文化通过丝路直接交往的不多的例证。这一时期,中国内地因各种原因到达西亚、并有记述的人,仍然是屈指可数。如唐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大食灭亡前后,其王卑路斯、子泥涅斯等曾到长安;^③唐朝与大食的通贡。公元751年唐与大食的怛逻斯之战,唐军战败,被俘的杜环(《通典》撰者杜佑侄子)曾被带大食,周游地中海沿诸国,前后11年,回国后撰《经行记》一书。只是到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三次“西征”,势力曾达欧洲和北非,东西方才有了一些正式的交往;但是,东西方诸本源民族相互之间的直接沟通,仍然是屈指可数,相互之间的认识 and 了解,仍然是不十分清楚的。这种情况,直到十八世纪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者(包括传教士)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后,才有所改变。

就西方的古代文献所记,在公元前四世至公元五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希腊拉丁作家关于远东文献中,提到一个叫“赛里斯”的民族,说他们能从森林里树上摘取羊毛,即丝绸,可见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东方的中国及丝绸了解不多。^④只是到六世纪,养蚕织丝的技术才由中国的新疆逐渐传入到欧洲。关于养蚕织丝技术的传播,有玄奘《大唐西域记》、敦煌石室发现藏文文书《于阗

① 参见《史记》卷《张骞列传》;《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②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③ 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波斯”条。

④ 参见[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国史》及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北丹丹乌尼克遗址出土的著名的板画，描述了嫁至于阗的东国公主藏蚕种于帽絮中，而将养蚕织丝技术传入西域；六世纪时，才由西域传到拜占庭，“从此之后，拜占庭使开始饲养蚕了”。^①从六世纪至十三世纪，有文献记载到过中国内地的西方人也是屈指可数，如上述波斯萨珊朝国王卑路斯父子，还有从海路来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②当然从丝路到中国沿海城市及内地贸易的阿拉伯商人甚多，有的则居住于广州等城的“蕃坊”内。到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后，曾三次“西征”，丝路复兴，到中国内地的西方人，见于记载的有著名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奉教会之命出使蒙古的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carpin）、法国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及意大利人鄂多立克（Friar Odoric）等。^③就是到十七世纪初，西方对东方中国的了解仍然有限，西班牙国王甚至支持在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探查”西藏及“震旦”，目的之一就是弄清西方及印度所谓的“震旦”，是否就是中国。鄂本笃于1602年启程，经叶尔羌到甘肃的肃州，最后病死在那里。他最后弄清了震旦即中国，并探索到中国的便捷道路。^④

总之，在古代东西方的丝路上各本源文化的民族的直接交往和相互了解并不多，他们在丝路上的主要作用是在于提供了中西方文明交往的本源和基础。

属丝绸之路第二种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是丝路上最为活跃的民族。他们不仅在丝路上深受东西方文明的影响，进行着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最重要的是起到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中继和桥梁的作用。

以丝路作为中西方贸易道路的本质而言，其路程的遥远与艰辛，使相距甚远的西亚、欧洲、北非、南亚的民族或国家与中国内地的直接贸易，十分困难。事实上，东西方的贸易，往往是通过上述第二种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的

① 见普罗科波（500—566年）《司特人的战争》，转见 [法] 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22—423页。

② 见佚名著，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伊本白图泰著，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参见党宝海注本《马可波罗行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117页。

转手或中继的形式,才得以实现的。就如中国的丝绸之成为欧洲罗马等地的时髦商品,实际上是通过漠北、中亚或印度、波斯一站一站转买到罗马的。公元六世纪,波斯为垄断与罗与的丝绸贸易,曾将经中亚贩丝至西亚的康居(粟特)运来贡献之丝,“对众焚之,以示其不用来自突厥之丝”,致使突厥与波斯交恶。^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公元四世纪至七世纪立国于青海的吐谷浑族,中亚阿姆河南的唃哒人欲与南朝梁朝贸易,经青海的吐谷浑,史称“其(唃哒)言语待河南人(即南朝对吐谷浑的称呼)译然后通”。^②公元553年(魏废帝二年),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截获一个出使北齐归来的吐谷浑使团,“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③。此两例将作为丝路中继文化类型民族的中继和桥梁作用显现无遗。

在丝路的文化交往方面,同样如此,印度的佛教、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及稍后的伊斯兰教等,也是多由中亚粟特人、西域诸城郭国人、漠北回鹘人等中继文化类型的民族,沿着丝路,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印度乐系和伊兰乐系的音乐舞蹈,也总是先传入西域,进而到凉州,形成著名的“龟兹乐”、“西凉乐”等,再传到京师长安,引领唐代之风尚。在科技方面,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由于751年怛逻斯之战,唐军俘虏中的造纸匠首先在中亚撒马尔罕造纸,于是“撒马尔罕纸”才风行欧洲,随后造纸术才传入欧洲。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丝路第二种中继文化类型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相信一定能发现他们在中西交往中突出的中继和桥梁的作用。他们是丝路上最有活力和最具多元文化特性的民族,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

三、丝路上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丝绸之路的本质应是由东西方贸易道路为标志,涵盖着东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的内涵。除此而外,我们还认为,丝绸之路还涵盖着丝路沿途诸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也就是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路。

早在丝路正式开通之前,即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西北古代民族

①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09-210页。

② 《梁书》卷五四《诸夷传》“滑国”条。

③ 《周书》卷五〇《吐谷浑传》。

就因各种原因,已经在丝路上迁徙。如公元前 200 年左右,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冒顿单于西击在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迫使其沿丝路迁于伊犁河流域,以后又由于乌孙族攻占其地,月氏迁于中亚阿姆河地区,征服大夏而居之。乌孙族遂居伊犁河流域。^①又如,东汉初,汉逐北匈奴,使之经西域而达中亚、欧洲,称匈(Huns)人,据学者研究,今日欧洲的匈牙利内民族就有匈人的成分。此后,漠北和东北的游牧民族如鲜卑、柔然、唃廝囉、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族,均有西迁之举,致使到 10 世纪后,中亚地区各族突厥化、伊斯兰化。

以上大致是由东向西迁徙之民族。由西向东迁徙的民族,同样是数不胜数,如公元前数千年西方的雅利安人向印度的迁徙;希腊人随亚历山大的东征,而进入西亚波斯等地;塞种(Sakas)向西南迁至罽宾和帕米尔高原;贵霜人之进入天山以南地区;阿拉伯人之东进中亚,等等。总之,近二千年的丝绸之路上,许多民族因各种原因而迁徙,即是说,民族的迁徙是在丝路上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迁徙之路。

不仅如此,丝路上的诸民族,因政治、军事或经济、文化(特别是宗教信仰)等原因,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消亡了,或并入、融合到另一个民族之中,有的民族则同化四周的其他民族,而日益兴盛、壮大;甚至于有新的民族不断的形成、发展。即是说,丝路上,不仅存在着民族频繁的迁徙,也存在着民族同化和融合。历史上,丝路上民族融合的例证很多。比如原在辽东的游牧民族鲜卑的一支吐谷浑,西迁阴山,后又迁至青海、甘南,与当地羌、氐等族长期杂处,最后形成成为吐谷浑族。^②魏晋南北朝时,极盛一时的鲜卑族西迁、南下,最终大部分融入汉族。又如漠北的回鹘汗国灭亡后,其部众西迁西域,与当地土著融合,到十六世纪正式形成为今天的维吾尔族。回鹘西迁的一支黄头回纥,最后成为近代中国裕固族的组成部分。由于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使大量中亚等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工匠、兵士等东迁入中国西北各地,他们娶妻生子,称为“回回”,到明初最终形成为中国的回族,等等。

总之,丝绸之路又是一条民族迁徙和融合的路,应是毫无疑义的。

① 参见《汉书》卷九六上下《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乌孙国”条。

② 参见拙著:《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42-153 页。

考察草原丝绸之路的法国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耿昇

穿越戈壁绿洲的西域丝绸之路、穿越北方沙漠和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在西南重山峻岭中盘亘交错的西南丝绸之路、漂移在世界三大洋万顷碧波巨浪中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网络中的四大交通干线。草原丝绸之路也被称为北方丝路、毛皮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和铁器之路等等。草原丝路研究意义重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空白领域甚多，非常值得作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

从丝绸之路的开通时代来看，北方草原丝路与西北戈壁绿洲之路，基本上应为同期的。早在公元前7—2世纪之前，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干线，还不应该是环塔里木盆地四周的戈壁绿洲之路，而更应该是从中国黄河河套地区出发，经蒙古草原向西北逐渐延伸，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流域北行，穿越南西伯利亚草原，到达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中，再从那里向中亚和欧洲伸展的草原之路。在这条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蒙古草原与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应该是起着枢纽作用。继西域戈壁绿洲丝路处于鼎盛时代后，草原丝路略却遭冷落。继15—16世纪之后，海路大举开通，西北丝绸日趋衰落，并有被海路大规模取代之势。但北方草原丝路却无法完全被海路所取代，只有骆驼队、汽路和铁路的更新换代。中俄之间的交通，以及经俄罗斯而沟通的中西交通，始终在稳定地发展。在18世纪时，西方入华传教士们在向欧洲寄送中国的文献资料、植物种籽和苗木、动物标本以及中草药等物品时，由于海难频发而导致损失残重，以及那些需要干燥保存的物品，难抵海洋潮湿环境的侵蚀。他们于是便毅然地选择了“莫斯科之路”。这些欧洲传教士们，为此目的，还想方设法地成为帝俄皇家科学院的院士或通讯院士。这就使俄

罗斯及其占领的中亚地区成了中西交通中的大驿站。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经北方草原丝路的中俄(甚至中西)之间的茶叶、毛皮、瓷器和中草药(尤其是大黄)的交易。依然兴旺发达,特别是存在着一条“恰克图之路”。直到从 20 世纪中叶起,由于中俄国内形势巨变和东西冷战诸因素,北方草原丝绸才开始走向萧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草原丝路又开始复兴。

从草原丝路所覆盖的地理和民族范畴来看,它与西域戈壁绿洲之路在西部有重合,在北部有交错,在东部有独特区域。这条路线或这片路网,几乎涵盖了阿尔泰语系的所有民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民族;中国古代北方的狄与胡系的诸多民族,尤其是匈奴人;古代印欧语系的诸多民族,如斯基泰人、贵霜人、塞人和口压 哒人等;南西伯利亚的许多土著民族与部族;斯拉夫语系的某些民族。虽然北方草原丝绸穿越的地域,没有西域丝路那样辽阔,但它仍形成、支持并促进了多地域和多民族之间的联系网络。

从输送商品的角度来看,北方草原丝路输送的商品,除了永远的丝绸之外,主要是茶叶、皮毛和羊毛制品,瓷器、铁器和中草药,而且其数量很有可能会达到和甚至超过西域丝路。在物质交流之外的文化交流方面,北方草原丝路传播了世界的几大宗教:佛教(以喇嘛教或藏传佛教为主)、萨满教、祆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宗教(景教和天主教方济各会),以及各种土著巫教和图腾崇拜(草原石人和岩画等)。它将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中亚穆斯林文明、沙漠绿洲文明、草原文明、斯拉夫文明和远东其他文明,都互相沟通和互相融合起来了,从而为中西或东西文化物质交流的发展,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这条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就吸引了中外许多探险家和从事考察的学者。在近代以来,西方的各种人士,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这条道路上。本人试对几位法国探险家、外交官、学者与传教士在这条道路上的考察活动及其成果,略作钩沉。

一、法国探险家莱斯丹伯爵对准格尔旗和成吉思汗陵的考察

莱斯丹伯爵(Le Comte Jacques Bouly de Lesdain,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人)是法国的探险家。早在 1902 年,他便从事了一次赴蒙古的旅行。两年之

后,也就是在 1904 年,他在其刚刚 20 岁的新婚妻子的陪同下,又从事了一次“从北京到印度”的探险旅行,由北至南地穿越了蒙古地区以及康藏高原。这些地区当时已不再是陌生之地,但旅行的困难和危险性依然很大。由于他们夫妻出身于富家,故而可以雇佣一支骆驼队和一支人数不少的卫队,从而大大地方便了其旅行。他们在进入蒙古之前,曾在大同云岗石窟作过较长时间的停留与考察,属最早对外报告云岗石窟艺术的外国探险家之列。他们在穿越康藏高原时,又详细地考察了长江的源头。他们于 1906 年,考察蒙古地区(草原丝绸之路)时,重点考察了准格尔旗与成吉思汗陵。莱斯丹伯爵于 1908 年出版了其游记《经蒙古赴西藏的旅行,从北京到印度》^①一书。

马可·波罗是西方第一个介绍成吉思汗被安葬在“阿尔泰大山中”的人。他甚至还具体解释说:“人们甚至遵守某种惯例,在大汗和大王公逝世后,都被运往一个叫做阿尔泰(Altai)的大山中安葬。”无论死者在哪里,即使有百日行程之远也一样。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安葬在其他地方。^②

无论是中国人、穆斯林的还是西方的任何作家,在有关成吉思汗陵的地点问题上,其看法从不一致。据说,唯有某些蒙古人才知道成吉思汗的安葬地。出于安全原因,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的陵寝(很可能在同一地方),从不向外泄露。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所选择的陵寝在肯特山。

莱斯丹伯爵夫妇于 1906 年到达伊金霍洛旗(Edchen Koro, Ejin Horo)。他们认为成吉思汗晏驾于陕西西部的六盘山,埋葬在伊金霍洛。他们对该地区作了专门考察。

他们的本意是沿一条直通宁夏的斜向大道,而横穿整个鄂尔多斯地区。他们沿途曾向 4 名蒙古王子支付款项,并且参观了闻名于世的蒙古大征服者成吉思汗墓地的建筑遗迹。该墓葬在当地颇受尊崇。

他们为了前往拜访的第一位蒙古王爷准格尔王的王府,经过了大批沙丘和汉族农民耕耘的平原农田,也有山丘地带。该地区唯一的一条河乌兰木伦河,经过东北而流经高原,其水深在 7 月间最多不会超过 5~6 法尺(pouce, 法国古代长度单位,约合 27.07 mm)。

① Comte de Lesdain: Voyage au Thibet. Par La Mongolie. De Pékin aux Indes, Paris. Plon, 1908。

② 韩百诗:《马可·波罗寰宇记》(Louis Hambis, La Description du Monde de Marco Polo, Klincksieck, 1955) 的注释。

准格尔旗王府，在数年前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地位。很可能是那里的牧草变得越来越劣质了。因为当时执政的王子将其旗政府所在地迁到了别地。当他们到达一座小山山巅时，突然间发现了多座建筑物，位于几乎是在绝对荒凉的地方，显得格外壮观。它们是一些宫殿。王子居住的那座王府，由一道已坍塌的 5 米高的围墙环绕。它有两个大门，其一为南大门，直接向王府内建筑物开放。这些建筑物是一幢纯汉式的大房子，按照“天子”们所钟爱的风格建造，即带有三进中心院、由小块玻璃装饰或有时糊窗户，建筑物的墙和围墙均以砖砌成，从而使建筑整体产生了一种几乎是赏心悦目的外表。在距那里不远的地方，又插着小军旗、经幡。它们标志着王子在重大场合下举行祭祀的寺庙，如当畜群爆发瘟疫、缺雨，或者是他们在北京朝廷中的事务逆转的时候，都一概举行祭祀。

该王公不失时机地起来迎接远来的莱斯丹伯爵。莱斯丹伯爵刚刚于其王府的厢房安顿下来，便前来拜访他们。他身穿官服，由一群满身污垢的官吏扈从。他送给他们一只烤全羊，这在蒙古地区是一种高贵规格的待客礼遇。他还为他们带来一席他自认为是欧式烹调的晚餐。他在回答法国人有关成吉思汗陵的问题时，声称距那里很远，并且根本不可能到达那里，而且任何人都没有墓地的钥匙。一切都显得很不好，因为其前任于 1898 年因接待的法国探险家博安 (Charles Bonin) 受责一事，即发生在鄂尔多斯北部。

蒙古王公表现得非常倾向于为欧洲人服务。他首先向法国人博安洩露了义和团攻打北京使馆区及其起义的时间。博安认为自己有义务立即通知法国公使馆。但法国公使馆却既未立即采取措施，甚至也没有从事调查并通知其他国家的公使馆，而是将博安视为一个性格古怪和反复无常的人，将其信件装入档案袋中，然后便忘在脑后了。法国驻北京领事馆确实在该王公指出的时间遭到了攻击。这一切都说明，中国于 1900 年爆发的事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也可能会使许多人免遭血腥。

准格尔旗的原王公，此时并未居住在该王府。他在稍靠北部一些的地方，于一道卫墙之外，也建立了一座漂亮的王府。它被建造得很精致，恰恰建于一个公园的中心。在该建筑物的第一进内院中，有一些玫瑰花盆和喷水池，这一切在鄂尔多斯堪称一种真正的豪华。他身后留下的众多王妃中的一、二名，至今尚生活在那里，并以怀念昔日的美好日子或吸鸦片而消耗时光。